論　著

個人經驗與公共領域：《婦女雜誌》通信欄研究(1915-1931)

葉　韋　君[*]

摘　要

《婦女雜誌》為研究民國婦女史的重要文本，已有許多成果豐碩的作品，但鮮少研究者討論雜誌與社會溝通的功能。本文利用中研院近史所「婦女雜誌資料庫」，研究該雜誌的通信欄在報刊發展上領先並持續引領的角色，作為觀照民國公共領域的重要案例，且探討個人經驗進入公共領域的過程，以及性別身分與社會議題的運作。

研究結果顯示，男性在性別議題的公共領域暴露許多的情緒書寫，女性則自重自持、謹慎維護得來不易的公共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第 29 期（2017 年 6 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空間。男性主編易於編纂男性的性別經驗，成為控訴舊婚約的集體敘事，但他們無法掌握女性的婚戀故事，她們充滿差異且散落。主編挑戰社會界線的「性」議題，成為與讀者的衝突點，並因此收束「通信欄」，取消公開開放的討論空間，使公共論壇內縮為家庭生活。整體而言，五四風潮帶動個人自由的媒體宏旨與社會氛圍，促使讀者更樂於提到個人經驗，而鮮少提到「國家」，但這樣的自由主義女權，隨著戰爭迫近轉向國家女權與集體主義動員。

關鍵詞：公共領域、性別、個人經驗、通信欄、婦女雜誌

一、前　言

《婦女雜誌》因發行量大，發行時間長，影響層面廣，為研究民國婦女史重要的文本，已有許多成果豐碩的作品。這些研究的共同點，是以《婦女雜誌》為資料來源，著重探討性別意識、婦女生活的轉變，包括娼婦問題、兒童教養、女性文學、醫療信箱，以及性道德、自由離婚、生育限制等，[1] 但較少探討《婦女雜誌》社會媒體的角色，因此容易順從傳播者的觀點，而忽略讀者的接收面。

1　代表專著有 Jacqueline Nivard, "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 (*Funü Zazhi*) 1915-1931," *Republican China*, 10-1b (November 1984), pp. 37-55. Wang Zhe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周敘琪，《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代都會新婦女生活風貌：以《婦女雜誌》為分析實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6）。團體著作有中研院，《婦女雜誌研究專號》，《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2004 年 12 月）。

既有探討《婦女雜誌》與讀者關係的研究有三類型，分別由編輯風格、讀者日記、醫療諮詢專欄等主題切入。陳姃湲認爲《婦女雜誌》於 1919 年改版後，主編大幅縮減家政、衛生等生活實用專欄，轉而討論家庭革新、婚戀自由等議題，因而開發大量男性知識青年讀者，原先設定的女性讀者反而減少。雜誌於 1925 年再度改版後，轉向文藝風格，此舉雖被學界視爲保守復辟，卻有助於女性讀者數量回升，由此顯示性別身分因應編輯風格而產生變動。[2] 周敘琪則從惲代英(1895-1931)的日記，描繪讀者如何透過《婦女雜誌》建構家庭生活理想。惲代英將雜誌做爲新婚禮物，教導妻子經營家庭，並藉投稿表達情意，雜誌在他生活中佔有重要位置，顯示個人閱讀史深刻細緻的一面。[3]

張哲嘉從「醫事衛生顧問」欄，分析 1,412 封讀者來函，包括性別、籍貫、年齡、問題意識的分布，結果顯示男性比例略高於女性(199：175)，但從時間來看，則是由 1925 年的二成女性，逐漸攀升爲 1928 年後的五成，與上述陳姃湲的結論相同，後期女性讀者逐漸增加。讀者關注問題則以年輕學子在意的外貌、視力、腦力爲主，顯示讀者年齡層偏向青少年。[4] 上述的研究使我們更貼近讀者群，探索雜誌的社會影響，結果顯示讀者並非概括接收刊物內容，而是隨時調整

---

2 陳姃湲，〈《婦女雜誌》(1915-1931)十七年簡史——《婦女雜誌》何以名為婦女〉，《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2004 年 12 月），頁 1-38。

3 周敘琪，〈閱讀與生活——惲代英的家庭生活與《婦女雜誌》之關係〉，《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卷 43 期 3（2005 年 7 月），頁 107-190。

4 張哲嘉，〈《婦女雜誌》中的「醫事衛生顧問」〉，《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2004 年 12 月），頁 145-168。

關係。若能再擴大分析讀者群，不限於某個時期或特定個人，將有助於我們理解公眾議題發展的過程，並進一步解釋既有研究中，性別、戀愛、性與生育等議題如何進行社會溝通。

爲擴大《婦女雜誌》讀者群分析並解釋社會溝通運作的過程，本文以「通信欄」爲題材，藉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婦女雜誌資料庫」建立「讀者通信目錄」。[5] 首先是「通信者身分目錄」，包括姓名、性別、地域、年齡、職業等，分析通信者的基礎資料。第二步是建立「通信議題目錄」，類目包括婚戀、性、家庭、生育、社交、服儀、教育、職業、經濟、國家、生活資訊、醫學、編務、宗教、法律、階級、生活經驗等。這些類目是根據通信內文提到的議題而設，所以一篇通信可能涉及多重議題，如〈女子在改造時代的自覺〉，[6] 該文認爲新女子不應重視外貌，必須有相當的教育程度，才能支持經濟獨立的自覺，涉及類目有服儀、教育、經濟等。「通信者目錄」與「通信議題目錄」的整合，可用來分析不同身分的讀者所關注之議題及其流動趨勢。

《婦女雜誌》「通信欄」研究的重要意義有三，首先在於它較早且較長的發展歷程。研究者透過數據資料庫，得以描繪「通信欄」整體發展的趨勢，這是過去紙本資料難以發掘的問題，得拓展過去以名人、言論爲主的公共領域研究，

5 包括「通信」、「通訊」、「通信問答」、「本社通信」、「讀者俱樂部」、「讀者論壇」、「自由論壇」等開放讀者討論的欄目，同樣刊登讀者通信的「醫事衛生顧問」、「攝影技術顧問」因為限縮於特定主題，而不在此列。

6 陳其善，〈女子在改造時代的自覺〉，《婦女雜誌》，卷 7 號 4（1921 年 4 月），頁 123-124。

將讀者生活經驗納入範疇。[7] 其次，「通信欄」可提供報刊數據資料適當的研究框架，將編輯群與讀者群設定在有意義的單元內，可詮釋社會溝通的變化。最後，著重解釋刊物的性別特質，民國女性在公共領域的發言並不常見，當她們被邀請、鼓勵爲發言主體時，她們如何表述？又如何被表述？目前的婦女刊物研究，多將問題焦點置於女性編輯群，而較少觸及女性讀者的論述空間。[8]

「通信欄」最初在中國報刊出現，是帶來遠方消息的新聞欄目，如《萬國公報》(1874-1907)、《時務報》(1896)的「海外通信」、《安徽白話報》(1908-1909)的「地方通信」，或公開同人信件，具有經驗分享與觀點倡議的「來函」、「投函」等。「通信欄」發展爲公開徵求讀者信件的常設欄目，可能稱作「通信」、「通訊」、「讀者信箱」、「讀者論壇」、「讀者園地」等。根據楊琥研究，最早而知名的「通信欄」

---

7 民國公共領域研究多以知識分子言論或報社編輯的意圖為主題，較少討論社會大眾的迴響，代表性作品有李金銓編，《文人論政：民國知識分子與報刊》（臺北：政大出版社，2009）。李金銓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唐小兵，《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以《大公報》「星期論文」和《申報》「自由談」為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此公共領域研究典範對情感、通俗誘因的排斥，將導致討論的侷限性，難以深入社會大眾，相關分析可見 Lean Eugenia, *Public Passions: The Tria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pp. 1-11.

8 相關研究可見 Ma, Yuxin, *Women Journalists and Feminism in China, 1898-1937* (Amherst, N.Y.: Cambria Press, 2010). 劉人鋒，《中國婦女報刊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張麗萍，《報刊與文化身分：1898-1981 中國婦女報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爲《甲寅》(1914-1927)，[9]《新青年》（青年雜誌，1915-1922）、《婦女雜誌》起而效之，後續又有《民國日報》副刊覺悟「通信」(1920-1932)，《申報》「讀者通信」(1925-1931)、「店員通訊」(1932-1933)、「業餘信箱」(1933-1935)，《生活》週刊「讀者信箱」(1926-1933)，《大公報》「公開評論」(1931-1933)、「讀者論壇」(1930-1931)等，衡諸戰前（1937年）通信欄發展，僅有《民國日報》與《婦女雜誌》通信欄有超過十年的歷史。[10]

「通信欄」由於未限定讀者身分與討論的主題，較能反映多元、日常的經驗，往往被視爲佐證社會生活的資料來源，但最大的問題是眞僞難辨。報刊史上爲人所知的案例，有新文化運動的支持者錢玄同(1887-1939)於《新青年》僞作「通信」製造論爭，[11] 婦女期刊《玲瓏》(1931-1937)創造女性編輯陳珍玲與讀者談心。[12] 這些僞通信影響研究者對事實的判讀，但確實是有效的讀者策略，能夠引起社會迴響。從媒體建制的觀點來看，報刊是幫助人們建構有心理影響力的共同實體，而非眞實世界的複製。[13] 這並非意指報刊內容的

---

9 楊琥，〈章士釗與中國近代報刊『通信』欄的創設──以《甲寅》雜誌為核心〉，《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 36 期 4（2012年），頁 100-108。

10 通信欄目探勘，借助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資料庫」、北京愛如生「晚清民國大報庫」、中研院近史所「婦女期刊資料庫」、「申報(1872-1949)全文料庫」等。

11 王敬軒，〈文學革命之反響〉，《新青年》，卷 4 號 3（1918 年 3 月15 日），頁 265-268。

12 章霈琳，〈性文化與期刊出版：以《玲瓏》(1931-37)為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5（2015 年 6 月），頁 117-192。

13 Phyllis C. Kaniss, *Making Local New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 65-68.

眞實性不重要，而是在分析上側重它的社會影響力，特別是在讀者通信上，難以辨識的個人身分與經驗一旦躍然紙上，就成爲讀者共同認知、據以溝通的內容。

二、編輯風格與通信欄發展

民國時期最重要的出版機構之一，商務印書館，自 1902 年創刊《外交報》(1902-1911)，至 1937 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期間，共編訂 76 種刊物，發行超過十年的有 16 種，《婦女雜誌》爲其中之一。[14]《婦女雜誌》是以商業利益爲考量的傳播媒體，有一定獲利發行量支持，它肩負主流文化的責任，並有助於接受衝突的意見，開發不同觀點的市場，從它歷經兩次重要的轉型，可見它對讀者回應的重視。[15] 先驅研究者將《婦女雜誌》區分爲「草創期(1915-1919)」、「成長期(1920-1925)」、「復古期(1926-1930)」、「再興期(1930-1931)」。[16] 本文對「通信欄」的研究發現也符合此設定，因爲主編對言論的開放程度，往往也是他們對「通信欄」的態度，我們可以從歷年欄目與通信量分布，發掘兩者的互動關係。

---

14 戴仁，《上海商務印書館 1897-1949》（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 113-114。

15 初期發行量約有二、三千份，「成長期」攀升到一萬份以上，見章錫琛，〈從商人到商人〉，《中學生》，期 11（1931 年 11 月），頁 99-112。

16 首見於 Jacqueline Nivard, “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 (*Funü Zazhi*) 1915-1931,” *Republican China*, 10-1b (November 1984), pp. 37-55. 這個分期法多為後續研究者採納。

表一　各時期欄目一覽表

時　間	主編者	專　欄　名　稱
1915	王蘊章	論說、女學商榷、圖畫、美術、藝海、學藝、家政、文苑、小說、名著、傳記 、餘興、**通信**、紀載、調查、附錄、雜俎、補白
1916	胡彬夏	徵文、社說、圖畫、學藝門、家政門、文苑、小說、國文範作、餘興、**通信**、記述門、中外大事記、雜俎、補白
1917-1919	王蘊章	社說、圖畫、學藝、家政、國文範作、餘興、名著、**通信/訊**、家庭俱樂部、兒童領地、通信處（滑稽通信）、補白
1920	重整期	專題號、社說、通論、評論、圖畫、美術展覽會、常識、名著、餘興、文藝、婦女新消息、雜載、**讀者論壇**、談話會、家庭俱樂部、兒童領地、通信處（滑稽通信）、譯論
1921	章錫琛	徵文、圖畫、家庭衛生、婦女工藝、常識談話、家事研究、民間文學、讀者文藝、世界珍聞、婦女消息、風俗調查、補白、趣味之科學、新游藝、笑苑、**讀者俱樂部、自由論壇**、<u>編輯餘錄</u>
1922	章錫琛	專題號、徵文、評壇、插圖、圖畫、讀者文藝、婦女消息、世界婦女狀況、附錄（法案、請願）、科學談屑、**自由論壇、通信/訊**、<u>卷頭言、編輯餘錄</u>
1923-1925	章錫琛	專題號、徵文、插圖、文藝、世界婦女狀況、附錄、**通訊、自由論壇**、<u>卷頭言、讀前號、編輯餘錄、主張與批評、談話會、討論會</u>、醫事衛生顧問
1926	杜就田	專題號、徵文、插圖、**通訊**、醫事衛生顧問、攝影術顧問、補白
1927-1930	杜就田	專題號、徵文、插圖、醫事衛生顧問、攝影術顧問、補白
1931	葉聖陶	專題號、徵文、圖畫、小說、隨筆、**通信**、婦女談藪、補白、醫事衛生顧問
1931	楊潤餘	專題號、徵文、圖畫、小說、隨筆、婦女談藪、補白、醫事衛生顧問

說明：表內以黑粗體突顯**通信欄**，加底線為編輯強化議題設定的專欄，如<u>編輯餘錄、卷頭言、讀前號、主張與批評、談話會、討論會</u>等。1921 年重新改組，通信量開始攀升，於 1923 年達到高峰，1924 年章錫琛限縮通信欄，增加強調編輯意旨的專欄，並限縮討論主題，通信量大幅減少。1925 年 9 月杜就田接任主編，1927 年全面取消通信欄，1930 年 7 月葉聖陶接任，翌年 1、2 月短暫恢復通信欄，1931 年 5 到 12 月楊潤餘任最後一任主編。

綜合整理「欄目一覽表」（見表一）與「歷年通信分布圖」（見圖一），前者顯示編輯對讀者設定的轉變，後者則是通信量及議題的變化，我們可以發現各期編輯風格與通信欄的互動趨勢，當欄目易動時，通信量及議題也隨之改變。「草創期」側重女性日用知識的「學藝」、「家政」等專欄，初期通信量少，議題分布以「生活資訊」、「醫療諮詢」、「編務建議」等諮詢服務爲主。「成長期」取消「學藝」、「家政」等專欄，代以評論、時事訊息的「談話會」、「自由論壇」、「讀者俱樂部」等專欄，主編排擠過去的女性專欄，而強化好於公共討論的知識青年，此時男性／不明性別的通信者大幅成長，女性通信者僅微幅增加，有七成通信集中於此。「婚戀」、「教育」議題爲通信量最多者，編輯群倡議的「性」和「生育」議題則僅有少數通信。「復古期」大幅縮減專欄，偏向「徵文」以及「攝影術顧問」、「醫事衛生顧問」等專欄，通信量大幅下降，議題也圍繞於「醫療諮詢」與「生活資訊」，原先的公共討論內縮爲諮詢服務，終至全面取消。「再興期」曾短暫恢復「通信」，僅有 5 封女性通信，後因停刊而全面終止。

四個時期「通信欄」不均等的發展，指向不同主編對讀者群的想像，以下將分爲三個部分，說明其變化。「草創期」通信量少，但具有開創性意義，會花較多篇幅解釋溝通形式建立的過程。「成長期」佔據七成通信，主編與讀者的互動關係爲此節的分析重點，其中涉及通信者身分與議題分析，則放到下一節說明。「復古到再興期」，這兩個時期由於通信量大幅減少、停止後又短暫恢復，所以分析內容大爲縮減，將兩個時期合併爲一節，解釋公共溝通內縮與復甦的意義。

（一）草創期：編輯與讀者的發聲練習（1915-1920）

1915 年《婦女雜誌》創刊，在商務編輯部缺乏明確倡議目標的情況下，它佔據的是一個分眾市場，以滿足對婦女議題有興趣的讀者。[17] 這時期專欄包括論說、藝術、文學、家政與知識等類型，讀者被設想爲適合文藝與家庭生活的女性。刊物內容充滿古典遺緒，藝文作品「人鬼相雜」、[18] 知識訊息多歷史典故，而少現實處境披露，主編王蘊章(1884-1942)延續傳統性別秩序的意旨清晰。在這樣的編輯框架下，要開創女性公開自由發言的通信並不容易，因爲女性論述能力有限，且必須符合當時的性別規範。

1915 年 11 月號，第一次登載讀者通信 2 封，四川富順縣初等女學校長陳亦秦的〈余之學校生活〉，[19] 以及浙江小學教員詹雁來的〈衢州女學談〉。[20] 通信內容和既有欄目「紀載」的投稿相仿，由於沒有徵稿預告，這兩篇很可能是從該欄投稿而來，作爲示範之作，鼓勵女學生、女教師分享學校生活，校園也是當時女性少數被允許活動的公共領域。

---

17 據第二任主編章錫琛所述，商務印書館視《婦女雜誌》為營利刊物，對編輯內容並不重視，即使改版後，社方仍任用毫無婦女問題經驗的他為主編，並任其自由發揮。見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1897-1987)》（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頁 116。

18 開刊之初有意發掘女性作者，但女性作者仍不多見，而刊登故人作品，這時期的分析研究可見胡曉真，〈文苑、多羅與華鬘——王蘊章主編時期(1915-1920)《婦女雜誌》中「女性文學」的觀念與實踐〉，《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2004 年 12 月），頁 195-218。

19 陳亦秦，〈余之學校生活〉，《婦女雜誌》，卷 1 號 11（1915 年 11 月），頁 184-186。

20 詹雁來，〈衢州女學談〉，《婦女雜誌》，卷 1 號 11（1915 年 11 月），頁 186-188。

12 月號爲吉林女師學生駱靜儀來函，[21] 描述監學任雪航鼓勵女學生組織「勉學樂群會」，[22] 推崇她「矢志守節期報未婚之夫於泉下」，爲早期貞潔、報國的女性典範，具有繼承國家女權主義的意涵。[23] 這些來函雖列於「通信欄」，但並非以書信體呈現，而是單篇完整獨立的記述文，社方也沒有做出回應，顯然主編此時尚未意識到信件格式溝通的意義。

1916 年留美歸國的胡彬夏(1888-1931)接任主編，革新專欄，[24] 她新創「社說」闡述刊物宗旨，重設「通信」，強調是女性的公共論壇，增加「國文範作」，廣納女學生作品，以女性爲本位的企圖明確。1916 年 4 月，胡彬夏重設「通信」：

> 自本期雜誌始擬添通信一門，專為海內外女界與本社交換意見機關……通信時，婦女與婦女可自由談心、毫無拘束。但囂張浮薄之語、詭怪妄誕之說、恕概不登載，蓋風教所繫，婦女與有責焉。斯為婦女初次在

---

21 駱靜儀，〈吉林女師範學校學生駱靜儀來函〉，《婦女雜誌》，卷 1 號 12（1915 年 12 月），頁 172-175。

22 任雪航，1908 年組織常州女界保路會，1912 年任神州女界共和協進會財務部長，推動婦女參政權。見劉巨才，《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史》，（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4），頁 264。

23 晚清發展的女權革命為國族主義下的附屬品，強調女性解放與國族命運有不可分割的關係。相關研究見柯惠鈴，《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1900-1920》（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

24 胡彬夏為最早的女留學生之一，商務印書館以女界明星編輯招攬讀者，時人謝菊曾謂之「掛名主編」，實際主編仍為王蘊章。見謝菊曾，《十里洋場的側影》（廣州：花城出版社，1983）。但就編輯內容來看，胡彬夏新創「社說」、「通信」、「國文範作」等欄目，有開拓女性公共論述空間的意義。

眾目眾耳前發表意見之時，會其必光明秀偉良淑端雅也固宜，又關於本雜誌需改良處或另有求懇事，儘可直言，本社常樂聞之，時或並答語附載。彬夏識[25]

胡彬夏稱「始擬添通信一門」為通信欄重新定位，她刊載的第一封通信為晚清重要女性作家施淑儀(1876-1945)〈賢母良妻！妾婦教育！〉。[26] 施淑儀與胡彬夏，兩位女性意見領袖藉由「通信」闡述編輯意旨，主張女性本位意識，她們企圖通過同性情誼，打造女性公共論壇，鼓勵女子「自由談心、毫無拘束」，但同時警覺女子的公眾形象，要求女界同胞在發言時必須自重，謹慎維護得來不易的發聲管道。但此界說卻可能成為女性讀者的通信障礙，因為能夠合乎此標準的通信僅此 1 封，再無後繼者。

在胡彬夏主編時期，指陳「雜誌需改良處」的通信曾出現 3 封，但均未進入她所宣告的通信欄，也未獲她署名回應，顯然讀者對編務的指陳，未能達到她的通信標準。女性讀者持續在「國文範作」，由師長指導作文，甚至有讀者來信質疑「國文範作」為「吳江私立麗則女子中學」壟斷，指責「麗則之文不足以代表吾中華女界文藝」，[27] 可見此欄目才是女

25 彬夏，〈通信〉，《婦女雜誌》，卷 2 號 4（1916 年 4 月），頁 149。

26 彬夏、施淑儀，〈節錄復施淑儀女士書賢母良妻！妾婦教育！〉，《婦女雜誌》，卷 2 號 4（1916 年 4 月），頁 149-153。施淑儀為早期《婦女雜誌》的重要撰稿人，作品有《清代閨閣詩人征略》、《湘痕吟草》、《冰魂閣詩存》等，見張暉，《施淑儀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相關研究可見胡曉真，〈文苑、多羅與華鬘——王蘊章主編時期(1915-1920)《婦女雜誌》中「女性文學」的觀念與實踐〉，《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頁 185-188。

27 這封通信為上述 3 封指陳編務的通信之一，見知白女史，〈本社通信〉，《婦女雜誌》，卷 2 號 6（1916 年 6 月），頁 142。吳江私立麗則女

性讀者競爭的平臺，也是她們練習公開發言的方式。

1917 年胡彬夏卸任，王蘊章重掌主編，5 月開始集合讀者來信爲「通信一束」，內容圍繞「生活資訊」、「醫療諮詢」、「編務建議」。讀者此時仍在摸索與刊物關係，編輯則意識到「通信」格式意義。中國信函有嚴格規範，表現通信雙方的倫理階序與文化涵養（見圖二），更重要的是延伸溝通與信任關係。在讀者姚書翰與主編王蘊章的通信間，我們可見字、號、敬語、謂語所框架的階序，[28] 編輯透過公開稱謂，恭謹有禮地建立信誼，讀者在閱讀的過程，容易理解並延伸爲個人與編輯的關係，作爲潛在的溝通對象，建立自身與作者，及其他讀者的連結。

討論時事的通信出現於 1918 年 5 月，[29] 胡長風質疑滬江大學提出男女同校議題。王蘊章回信並未表達立場，而是邀王卓民以「社說」〈論吾國大學尚不宜男女同校〉因應。[30] 11

子中學之文列於「國文範作」，在通信刊載前，總計 79 篇中達 27 篇，超過三分之一，確實佔據較多篇幅。論其主因，1914 年胡彬夏歸國時，任該校教席，與國文教師錢基博（1887-1957）相熟，兩人共同推廣所致，這同時解決女性稿源不足的情形。見錢基博，〈吳江麗則女中學國文教授宣言書〉，《婦女雜誌》，卷 1 期 11（1915 年 11 月），頁 26。陸陽，《胡氏三傑，一個家族與近代中國科學教育》（上海：三聯書店，2013），頁 46。

28 平輩、晚輩不可直呼長輩「名」，而以「字」相稱，「號」則是文人雅士的互稱，也用以自稱，平輩男子間以「上言」、「謹上」為敬語，女子則以「襝衽」。見范橋編，《書信寫作鑒賞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頁 642。

29 胡長風，〈通信問答〉，《婦女雜誌》，卷 4 號 5（1918 年 5 月），頁 162-163。

30 王卓民，〈社說：論吾國大學尚不宜男女同校〉，《婦女雜誌》，卷 4 號 5（1918 年 5 月），頁 21-29。

月北京大學、新潮社康白情(1896-1959)撰文駁斥，[31] 雙方交鋒兩回都載於「社說」。[32] 之後，王蘊章再創「通訊」欄，刊載復旦大學學生領袖瞿宣穎(1894-1973)[33] 與「桂林葆蘽女子」[34] 的正反意見。「男女同校」論戰彰顯《婦女雜誌》作爲公共論壇的意義，「通信」、「社說」、「通訊」等欄目都有向讀者開放的特質，接納保守主義者、激進學生領袖、捍衛傳統的女子等不同立場的觀點。但這些討論大量應用文言、典故，不免讓讀者感受進入的文化門檻太高。另一方面，欄目突顯溝通性質的轉變，原本被表述爲信誼及諮詢的「通信」，無法完整回應讀者詰問時事，而由「社說」代勞，但讀者持續加入論辯，便再創「通訊」欄，只刊讀者來信而不回應。讀者可以明顯察覺主編王蘊章一直避免表達意

31 康白情，〈讀王卓民君大學不宜男女同校商兌〉，《婦女雜誌》，卷 4 號 5（1918 年 5 月），頁 15-21。康白情為北大學生領袖，1918 年與傅斯年、羅家倫等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月刊，1919 年參與五四運動，成立「少年中國學會」，創辦《少年中國》月刊。見李盛平，《中國近現代人名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頁 642。

32 王卓民，〈社說：吾國大學尚不宜男女同校商兌之駁議〉，《婦女雜誌》，卷 4 號 12（1918 年 12 月），頁 17-29。王卓民，〈社說：吾國大學男女尚不宜同校商兌之駁議（續）〉，《婦女雜誌》，卷 5 號 1（1919 年 1 月），頁 24-30。康白情，〈答難質論吾國大學尚不宜男女同校商兌之駁議有引〉，《婦女雜誌》，卷 5 號 4（1919 年 4 月），頁 19-30。

33 瞿宣穎，〈共同教育論之辨護〉，《婦女雜誌》，卷 5 號 4（1919 年 3 月）頁 137-138。瞿宣穎，為晚清軍機大臣瞿鴻禨之子，妻聶其璞(1894-1957)為曾國藩外孫女，1919 年活躍於五四運動，為重要學生領袖之一，譯作〈育兒問答〉等連載於《婦女雜誌》，見謝菊曾，《十里洋場的側影》，頁 78。

34 葆蘽女子，〈抉禮防辨正腐論〉，《婦女雜誌》，卷 5 號 4（1919 年 3 月），頁 142-143。

見，而是中立維持公開平臺，並嘗試利用不同欄目處理論述的強度。

男女同校的推動者康白情，率先在《婦女雜誌》上發言，才在《晨報》(1916-1938)陸續發表〈大學宜首開女禁論〉、〈北京學生界男女交際的先聲〉，[35]《婦女雜誌》實能發揮性別議題的領先角色，並主持正反意見平臺。但同時，康白情的同學，新潮社的夥伴羅家倫(1897-1969)點名批評商務印書館刊物，認爲《婦女雜誌》「專說些叫女子當男子奴隸的話」，[36] 這不僅是抨擊「反對男女同校」的保守意見，也讓整體編輯方針改弦易轍，雜誌原先維持中立的態度，不能呼應新文化運動潮流，顯示舊性別秩序的一方完全敗退。五四運動後，商務印書館穩健、保守的立場已不合時宜，1918年雜誌總銷售量由 14.6 萬冊掉到 11.6 萬冊，1919 年滯銷的刊物多達 60 萬冊。[37] 羅家倫的批評突出了新時代讀者的觀點，促使商務印書館勵行改組，朝新文化論壇轉型。

（二）成長期：知識青年佔領，婚戀議題發展(1921-1925)

章錫琛(1889-1969)主編時期，被視爲言論開放的高峰，有兩個明顯特徵：一、通信量上升，二、議論欄目增加。章錫琛第一年先刪掉吸引兒童讀者的「兒童領地」、「滑稽通

---

35 康白情，〈大學宜首開女禁論〉，《晨報》，1919 年 5 月 6、8、9、10 日連載，第 7 版。康白情，〈北京學生界男女交際的先聲〉，《晨報》，1919 年 5 月 20 日，第 7 版。

36 羅家倫，〈今日中國之雜誌界〉，《新潮》，卷 1 號 4（1919 年 4 月），頁 627。

37 周武，〈文化市場與上海出版業(1912-1921)〉，收入蘇智良編，《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態》（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頁 175。

信」，增加消息類「世界珍聞」、「婦女消息」、「風俗調查」，改「讀者論壇」爲「讀者俱樂部」，新增主編專欄「編輯餘錄」。第二年，他全面取消家政育兒欄目，刊載女性集會、請願、法案爲「附錄」，再將「讀者俱樂部」改爲「自由論壇」，強化議論的屬性，將讀者的媒體經驗由內化的家庭生活轉向公開論壇。章錫琛指涉現實與讀者對話的旨意明顯，通信量大幅攀升，大量男性及未表明性別的通信者加入。他進一步將離婚、生產制限、新性道德等爭議話題設專號，使討論婚戀的通信大幅增加，但談論性、生育的通信相當少（見圖一）。

章錫琛除了強化婚戀議題設定外，還爲讀者示範誠懇、理性的公共溝通，連續兩期刊登與友人王平陵(1898-1964)的通信〈戀愛問題的討論〉，之後又有婦女問題研究會的同志鳳子加入。[38] 他們藉由「通信」鼓吹自由戀愛，並將讀者納入友善的語境，只是新時代信誼，不再透過稱謂階序達成，而是日常問候：「很隨意地握著一支禿筆，和朋友們談談婦女問題，談到『恰到好處』的時候，或者稍可減殺一些暑熱呢！……弟王平陵上言」。[39] 讀者在通信中常向主編袒露情

[38] 鳳子，〈戀愛自由解續篇——再答 YD 先生并答王平陵章錫琛二位先生關於戀愛問題的討論〉，《婦女雜誌》，卷 9 號 2（1923 年 2 月），頁 43-45。婦女問題研究會，1922 年成立於上海，以研究婦女問題為宗旨，發起人有沈雁冰、周作人、周建人、胡愈之、蔣鳳子、章錫琛等人，以婦女雜誌社為聯絡處，章錫琛並以該會名義出版《新性道德討論集》等婦女問題研究叢刊。見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6），頁 55-57。

[39] 王平陵、章錫琛，〈通信：戀愛問題的討論〉，《婦女雜誌》，卷 8 號 9（1922 年 9 月），頁 120-123。王平陵，南京美術專科學校教師，

誼、崇拜，章錫琛大多只簡單回覆，相較於先前王蘊章平等互敬的禮節，章錫琛站在較高的位置，提供務實建議，被讀者視爲精神導師，我們可從他與一位士兵的通信，觀察到這種關係（見圖三）。

章錫琛與讀者的關係因爲婚戀議題凝聚，卻因生育及性議題而急轉直下。在 1924 年 6 月，雜誌發行備受爭議的《新性道德專號》以前，章錫琛就刊載多篇新性道德的文章，並已開始收束通信欄，不再回覆讀者信件。[40] 他增設多個編輯意旨的專欄，限縮讀者自由討論的版面，包括導讀的「卷頭言」，捍衛新性道德的「主張與批評」，改自由討論的「通訊」、「讀者論壇」爲設定主題的「討論會」，並將醫療諮詢類通信，專闢「醫事衛生顧問」欄處理，同時宣傳專欄主持人杜克明爲婦女及性慾學專家，[41] 藉此包裹備受爭議的性、生育議題。[42] 從這個變化，我們可以看出編輯決斷的過程，章錫琛原不熟悉性別議題，自譯作取得資源，[43] 進而謀

提倡民族主義文藝，主編《文藝月刊》，見錢仲聯編，《中國文學大辭典下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頁 1553。

40 1924 年 8 月後，「通信」幾乎停擺，1925 年 1 月發行《新性道德號》，2 月發佈「本社啟事」，宣傳新專欄「醫事衛生顧問」，並宣布「通信」此後僅擇重要者「直接函答，不再披露」，與讀者關係急轉直下。見〈本社啟事〉，《婦女雜誌》，卷 11 號 2（1925 年 2 月），頁 185。

41 見〈介紹杜克明先生〉，《婦女雜誌》，卷 11 號 6（1925 年 6 月），頁 282。

42 根據張哲嘉研究，這時期「醫事衛生顧問」31 封中有 15 封問到「性生活協調、腎虧、生殖器」等問題，另有 2 封是詢問妻子懷孕。見張哲嘉，〈《婦女雜誌》中的「醫事衛生顧問」〉，《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頁 145-168。

43 章錫琛自述接任主編時，對婦女議題並不熟悉，是與周建人從圖書館借來討論婦女問題的英、日文書籍：「東拼西湊寫些提倡婦女解放和戀愛自由一類時髦的短文」。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文史

求讀者互動的模式，「婚戀」是他與讀者最大的共識，此後他逐步強化主導性，不再尋求讀者回應，而一路往「新性道德」去。[44] 其實早在 1922 年 6 月發行《產兒制限號》就可見端倪，讀者通信涉及「性」、「生育」的回應並不多，這可能是讀者不感興趣，或難以啓齒，也有可能是批評意見被消音。可以確定的是，「性」與「生育」議題缺乏公共溝通的效果，而是編輯的單方面倡議。[45] 相較於草創期，王蘊章增設欄目以安置不同讀者意見，章錫琛則是取消讀者欄目，增設編輯專欄，他選擇壓抑可能構成威脅的讀者意見，阻止其形成公眾。

編輯與讀者的溝通不暢，只能由外部推翻，北大心理系教授陳百年(1886-1983)藉由《現代評論》(1924-1928)表達反對意見，[46]《晶報》也已先後提出批評。[47] 商務印書館面對反對聲浪，所長王雲五(1888-1979)，要求事先審核，而導致章錫琛去職。[48] 章錫琛曾經重視與讀者溝通的「通信」，沒

資料選輯》，輯 43(1983)，頁 61-105。

44 章錫琛，〈新性道德是什麼〉，《婦女雜誌》，卷 11 號 1（1925 年 1 月），頁 2-7。

45 此時外部批評聲浪大，且已不設通信，而〈徵文當選：讀新性道德號〉只列出五位支持的讀者意見，相較之前因鄭振壎〈我自己的婚姻史〉刊登 18 篇迴響，這個回應過少，可推論章錫琛有意藉徵文為自己辯護，但收效不大。見許言午等，〈徵文當選：讀新性道德號〉，《婦女雜誌》，卷 11 號 4（1925 年 4 月），頁 72-79。

46 百年，〈一夫多妻的新護符〉，《現代評論》，卷 1 期 14（1925 年 3 月 14 日），頁 6-8。

47 鷹淞，〈婦女雜誌與女子手淫〉，《晶報》，1923 年 7 月 15 日，第 4 版。鋒中，〈勸勸婦女雜誌記者〉，《晶報》，1925 年 3 月 24 日，第 4 版。

48 章錫琛，〈從商人到商人〉，《中學生》，期 11（1931 年 1 月），頁 99-112。

有文獻顯示，他是因讀者不再支持而取消「通信」，根據他自述，性論述仍然使發行量增加，卻是因得罪「鴛鴦蝴蝶派」與「老編輯先生們」才被檢束。[49] 但從欄目與通信的發展，我們可以發現，他所主張的議題已難引起讀者共鳴，公共溝通的管道滯塞，他不再利用「通信」說服讀者，而是以「卷頭言」、「主張與批評」等專欄自圓其說。相較於王蘊章因缺乏立場走得太慢，而被讀者拋棄，章錫琛則是走得太快且獨斷。

（三）復古到再興期：曇花一現的女性話語(1926-1930)

1925 年 8 月，主編章錫琛與「醫事衛生顧問」專欄主持人杜克明醫師離開《婦女雜誌》。杜就田接任編輯，他恢復自 5 月起就被章錫琛中止的「通訊」欄，但內容已不再討論社會議題或分享生活經驗，而是醫療與生活諮詢。1926 年 1 月，恢復「醫事衛生顧問」專欄，由程翰章醫師擔任專欄主持人，醫療諮詢類遂由「通訊」移出，全部爲生活諮詢通信取代，讀者關係由議論、共享，轉爲個人諮詢服務，回答問題如：馬口鐵的用處、篆刻的學習法等。4 月後「通訊」完全取消，「醫事衛生顧問」成爲唯一提供讀者服務的專欄，問答形式的諮詢，缺乏通信交流的情誼，讀者很可能得到答案就離開，較難維持忠誠度。張哲嘉的研究就指出，儘管主持人程瀚章不斷告誡中醫、成藥的風險，但相似的問題卻不斷出現，顯示宣傳成效有限。[50] 從傳播的角度來看，這表示

---

49 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1897-1987)》，（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頁 117。

50 張哲嘉，〈《婦女雜誌》中的「醫事衛生顧問」〉，《近代中國婦女

讀者群持續變動，他們隨時加入、退出，導致傳播效果無法累積，讀者群沒有進步，一直在原地徘徊。

此時期雜誌的專欄大多數都取消，內容爲「徵文」取代，幾乎佔全書六成，徵文題目多爲記述題材，如「非常事件的經驗」、「消夏瑣談」、「平常的夢」、「我的姊妹」等。另一方面，也有反對舊俗惡例的徵文題目，如「下層婦女的悲慘」、「我家所受於鬼神的損害」、「家庭的缺陷」、「無意義的忌諱」、「可憐的寡婦」、「沿舊俗不通世故」、「鴉片地獄」、「盲婚後的清醒」等，這些題目可透過集體書寫揭露現實，可能產生改造社會的說服力，但主編杜就田並沒有利用這一點，他只是刊登文章，讓讀者陳述各自的故事，編輯與讀者、讀者與讀者間不再對話，公共溝通因而停擺。

1930 年 7 月，葉聖陶(1930-1931)接第五任主編，1931 年 1 月，恢復「通信」欄，以「暴露現代社會的種種形相」，但仍堅持「一向不曾回覆」方針，避免「模稜兩可或偏鋒獨斷」。[51] 葉聖陶沒有如前任主編章錫琛爲讀者指路的編輯企圖，儘管只刊登二期 5 封通信即中止，但由於通信者皆署名女性而別具意義。通信欄經歷十六年的發展，女性通信數量遠低於男性，相形之下顯得零星且散落，並未如男性讀者般地集結，而今她們終於得被編纂爲集體的聲音，她們揭露現實處境，爲文不再只是哀憐自傷、乞求協助，而是控訴體制的剝削。她們是自曝「淪爲生育機器」的妻子黃秀芬，[52] 指

史研究》，期 12，頁 145-168。

51 〈通信〉，《婦女雜誌》，卷 17 號 1（1931 年 1 月），頁 221。

52 黃秀芬，〈一、生育的機器要做到幾時為止呢〉，《婦女雜誌》，卷 17 號 1（1931 年 1 月），頁 221-223。

責父親的失學女兒自珍，[53] 被迫離婚的主婦汪珏，[54] 將孩子視爲「不速之客」的母親蘇蘭英，[55] 以及在職場忍受差別待遇的辦事員劉玉。[56] 這些被集中編纂的女性，詰問父權（丈夫、父親、孩子、上司），拒絕傳統性別秩序分派的角色，部分反映女性主體意識的發展，此舉有助形成女性讀者的公眾反叛。可惜的是，葉聖陶並不知如何處理女性讀者的憤怒，他僅能將之公開而不作回應，不若章錫琛總是積極回覆讀者信件。最後一位出現的通信者，也是第一位非教師的職業女性劉玉，她的出現顯示日常性別經驗，從家庭、學校延伸到職場，這將是日後女性通信值得關注的一點，可預期往後將有更多來自工廠、商舖的女性經驗進入通信欄，成爲公共議題，但《婦女雜誌》卻又無預警地再度中止通信欄。1931年4月，葉聖陶離開商務印書館，楊潤餘(1899-1990)接任最後一任主編，1932年1月，日軍轟炸上海閘北，炸毀商務印書館，《婦女雜誌》永遠停刊。

通信欄經歷四個時期不均等的發展，「草創期」著重分析通信的起源與屬性，演示媒體建制的變遷，從諮詢服務到公共討論平臺。「成長期」好於議論的章錫琛有效凝聚讀者對婚戀議題的關注，而敗於更激進的新性道德。「復古期」的通信欄再度退回諮詢服務，缺乏公共溝通的功能。曇花一

---

53 自珍，〈二、現在的教育果真「全不是那麼一回事」麼〉，《婦女雜誌》，卷17號1（1931年1月），頁223。

54 汪珏，〈三、彷徨汪珏通信〉，《婦女雜誌》，卷17號2（1931年2月），頁107。

55 蘇蘭英，〈四、一個疑問〉，《婦女雜誌》，卷17號2（1931年2月），頁107-108。

56 劉玉，〈五、服務社會後的疑問〉，《婦女雜誌》，卷17號2（1931年2月），頁108-109。

現的「再興期」，承載新時代女性的憤怒，這是過去女性讀者較少表露的集體控訴，顯現女性的公共角色由退縮轉爲鮮明。

三、通信者身分與議題分析

《婦女雜誌》「通信欄」總計 365 封通信，包括評論類通信（讀者論壇、讀者俱樂部、自由論壇）125 封，以及分享、提問的書信類通信（通信、通訊、通信問答、本社通信）240 封，前者作爲評論主體，較少論及個人身分與經驗，後者則較多分享生活經驗，也較容易透露個人訊息。由於通信者揭露個人訊息的程度不一，研究者無法確知通信者的全貌，而將研究重點放在不同社會身分所進行的公共溝通。

「通信欄」作爲媒體建制的一部分，受制於組織運作的框架，並偏向容易取得意見的優勢群體，過去研究顯示，通信者以都會區男性、公教人員、學生爲主，具有明顯中產階級的價值偏向，他們有較高的政治效能感，是民意人口結構中關心的公眾，有被組織、動員的潛力。[57] 本文的分析結果也反映這樣的現實，《婦女雜誌》中表述身分的通信者，以江浙地區男性、教師與學生群體爲主，男性較女性有發展潛力，他們在通信期間仍多是學生，但在日後成爲意見領袖的比例更高，顯示男性讀者通信有助提升政治效能感，並成爲現實生活的資源。以下將逐步分析通信地、性別、社會身分與議題分布。

---

57 相關研究見 Rosenau, J. N.,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N.Y.: Random House, 1961).陳世敏，〈讀者投書：「接近使用權」的實踐〉，《新聞學研究》，期 41(1989)，頁 25-46。

（一）通信地分布

365 封通信中，有 171 封標示通信地，僅佔所有通信的四成七，其中評論類僅有二成標示通信處，書信類則有六成。根據可見資料，通信者以東南沿海區域爲主，又以發行地上海最多，其次爲長江、兩湖流域，兼及北京、南京，西南一帶僅有廣西，西北一帶有山西及西安，雲南、貴州、青海等地闕如，海外通信則有臺灣、香港、新加坡、越南、法國、美國（見表二）。此通信處分布，可說明《婦女雜誌》的影響範圍達內地與海外，但江浙一帶的讀者更容易表達意見。

表二　通信地分布

通信地	通信量	通信地	通信量	通信地	通信量
上　海	25	廣　西	3	長　江	1
浙　江	22	河　北	3	福　建	1
江　蘇	16	湖　南	3	濟　南	1
廣　東	13	遼　寧	3	甘　肅	1
安　徽	12	天　津	2	香　港	1
湖　北	11	山　西	2	南　洋	1
北　京	7	廈　門	2	新加坡	1
四　川	7	武　昌	2	越　南	1
南　京	6	西　安	2	美　國	1
江　西	6	吉　林	1	法　國	1
河　南	6	黑龍江	1		
山　東	3	古　越	1		

（二）通信者性別分布

觀察通信者性別分布，可確知性別的，男性有 114 封，佔三成，女性 74 封，佔二成，不明性別有 177 封，佔五成。[58] 有一半的讀者未透露自己的性別，也查無文獻記載，他們是普通、無名的讀者，儘管無法確認，但從男性化的署名及通信內容可以推測他們大部分是男子。[59] 民國公共領域仍是男性知識分子的舞臺，他們自爲地存在，而不需要標示男士、男子或男界、男校，能夠辨識出這些男性讀者，大部分是因爲他們在婚戀議題透露性別經驗，或者是校名，以及可在文獻中找到社會身分者。

可辨識爲女性的投書者，有八分之三是因爲署名女士、女子或標示女校，這顯示公共領域中，女性身分取得發言的一種方式，其中也有可能是男性僞作，爭取曝光。[60] 女性署名的方式，在當時即有爭論，1920 年學生領袖施存統(1899-1970)在《民國日報》就表示〈看不慣女士二字〉，認爲這反而是女子「不自重，甚至是不知羞恥的舉動」。[61] 這樣的攻

---

58 性別認定以署名、學校、或內容明確揭露性別，以及可以找到生平記載的通信者，其餘則歸為不明。

59 陳姃湲、江勇振從編輯策略、文章內容有較明確推論，認為讀者與作者均以男性為主，但缺乏明確的數據資料。見陳姃湲，〈《婦女雜誌》(1915-1931)十七年簡史——《婦女雜誌》何以名為婦女〉，《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江勇振，〈男人是「人」、女人只是「他者」：《婦女雜誌》的性別論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

60 「有許多男子的作者，往往用女子的名字來發表他的著作，以迎合讀者的心理」，見晏始，〈評壇：重男輕女與重女輕男〉，《婦女雜誌》，卷 9 期 4（1923 年 4 月），頁 32-33。

61 存统，〈看不慣女士二字〉，《民國日報・覺悟》，1920 年 4 月 5 日，第 14 版。相關研究可見黃興濤，《「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詞的發明與認同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擊還出現在女性維護同性的立場上，當她們爲沈默的、被遺棄的女子發言時，被男性批評爲「帶有性別偏見」。[62] 男性處在優勢的社會位置，他們無法感受女性的困境，而將男性定義的標準視爲合理的普遍價值，並要求女性服從。「厭女」幾乎爲民國婦女刊物的傳統，作者樂於歷數新舊婦女的缺點，滿足男性讀者的指摘。[63] 這也可以解釋女性通信者稀少的原因，她們在閱讀需求以及傳播語境中都被排擠，拒閱成爲她們可能抵抗的方式。[64]

（三）通信者的社會身分

有 28%的通信者可辨識出社會身分，學生佔全部的 19%、教師佔 5%、文化工作者佔 2%、女學生佔 5%、女教師佔 1%（見表三）。學生、教師、文化工作者接觸媒體經驗較多，這與他們所掌握的文化資源有關。對女性來說，學校是她們少數被認可的公共空間，她們具有正當性的公共生活，更容易在媒體公開，所以女學生與女教師成爲最初也最主要的女性發言者，她們對教育議題也有更高的關注。

62 相關分析可見許慧琦，〈《婦女雜誌》所反映的自由離婚思想及其實踐——從性別差異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頁 97-99。

63 江勇振，〈男人是「人」、女人只是「他者」《婦女雜誌》的性別論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頁 39-67。Barbara Mittler, "In Spite of Gentility: Women and Men in *Linglong* (Elegance), a 1930s Women's Magazine," in Daria Berg and Chloë Starr eds., *The Quest for Gentility in China: Negotiations Beyond Gender and Clas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208-234.

64 「接到許多女性讀者的來信，說本誌罵女子的文字太多，深為不滿，並且說他們的同性朋友中，竟有為了本誌的罵女子而不願意看的。」記者，〈編輯餘錄〉，《婦女雜誌》，卷 10 號 7（1924 年 7 月），頁 185。

表三 通信者身分比例

身分別	數 量	百分比
查無	262	72%
學生	68	18.70%
學生（女）	23	6.30%
教師	17	4.70%
教師（女）	5	1.40%
文化工作者	7	1.90%
文化工作者（女）	1	0.30%
商人	3	0.80%
律師	3	0.80%
舊文人	2	0.50%
公務員	1	0.30%
軍人	1	0.30%
教會	1	0.30%

透過通信處與通信者資料比對，可查到歷史記錄的有 28 人，男性 23 人、女性 5 人。[65] 男性中有 11 人在當時已有較高的社會位置，他們是商務印書館編輯胡寄塵（懷琛，1886-1938）、[66] 張梓生、[67]《民國日報》編輯嚴愼予(1901-1969)、[68]

65 查找人物辭典、中研院「近代史數位資料庫」、讀秀資料庫，比照姓名、通信處、年齡層等資料，若相符就視為通信者的身分。

66 熊月之編，《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頁 182。

67 周家珍編，《20 世紀中華人物名字號辭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頁 1146。

68 南京市檔案館編，《民國珍檔民國名人戶籍》（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頁 324-325。

社會學者王警濤、[69] 彈詞家許達初(1896-1970)、[70] 晚清書畫鑑賞家鄒雨生、[71] 同盟會及基督教長老會成員周亢宗、[72] 大學教授王平陵、鄭振壎，[73] 以及前述五四學運領袖瞿宣穎、康白情。另外 12 人多爲學生，日後成爲著名報人的張友鸞(1904-1990)、[74] 婦女史研究者陳東原(1902-1978)、[75] 兒童文學作家趙景深(1902-1985)、[76] 臺灣首位社會學者陳紹馨(1906-1966)、[77] 作家吳祖襄(1908-1994)、[78] 黃運初、[79] 汪劍餘、[80] 右派學生領袖沈鴻慈、[81] 共產黨員姜長麟(1899-

---

69 王警濤，《民生主義與人口問題》（上海：民智書局，1927）。

70 宋維遠編，《瑞安市志下》（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1673。

71 張德泉，《張德泉花卉白描寫生》（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02），頁 93。

72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 1 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293。

73 東南大學教授鄭振壎曾以曠夫筆名在《婦女雜誌》發表〈我自己的婚姻史〉引起廣大迴響，為研究民國婚戀觀的重要案例。見周敘琪，〈民國初年新舊衝突下的婚姻難題──以東南大學鄭振塤教授的離婚事件為分析實例〉，收入王政、陳雁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頁 88-107。

74 程曼麗編，《中國新聞傳媒人物志第 6 輯》（北京：北京上德經緯文化傳媒，2014），頁 1-2。

75 西南師範大學教授名錄編寫組編，《西南師範大學教授名錄》（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 158。

76 王榮華編，《上海大辭典下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頁 1870。

77 黃典權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九人物志人物傳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頁 487-488。

78 黃延復，《二三十年代清華校園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 527-528。

79 黃運初，胡愈之友人，越南華僑，譯安南民歌，常發表詩作。見胡愈之，《胡愈之文集第二卷》（北京：三聯書店，1996），頁 232-235。

80 汪劍餘，1924 年創辦神州文學社，發行《文學季報》。見宋聲泉，《民

1987)、姜還麟，[82] 陝西官員高崇福、[83] 新加坡華僑銀行經理馬奇傑。[84] 這些通信的男性具有發展潛勢，他們練習公共溝通的能力，在將來成爲意見領袖的比例更高。

在可辨識爲女性的 74 封通信中，僅有五人能找到身分記載，遠低於男性，她們是知名文人施淑儀、衢州天足會詹雁來，[85] 爲女性通信最早的示範者。具有發展潛勢的女學生，日後成爲慈善家的蔡倪端儀(1893-1985)，[86] 吉林女子小

初作為方法：文學革命新論》（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5），頁 40-41。

81 沈宏慈，廣東法政大學學生，右派學生領袖，於 1925 年組織士的黨（樹的黨／孫文主義學會）為激進反共學生團體，攻擊左派人士，遭國民黨開除。見楊天石，《國民黨人與前期中華民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頁 499。

82 兩篇投稿均署名姜長（還）麟，兩人為兄弟，於 1924 年先後加入國民黨與共產黨，進行地下秘密工作。見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上海黨史大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頁 320。

83 1923 年為陝西失學青年，見高崇福，〈通訊：陝西學界的現狀〉，《學生雜誌》，卷 10 期 12（1923 年 12 月），頁 134-135。1931 年成立新陝西月刊，任省政府民政組主任，見高崇福，〈陝西之社會文化：新陝西月刊創辦之經過〉，《新陝西月刊》，卷 1 期 1(1931)，頁 49-51。

84 馬奇傑，新加坡華僑，1928 年為新加坡青年勵志社主要職員，1932 年調任華僑銀行馬來西亞吉蘭丹分行經理，歷任吉蘭丹中華總商會會長、中華學校董事長。見潘醒農，《潮僑溯源集》（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頁 88。

85 詹雁來，清女學開拓者詹熙之女，1909 年杭州女校畢業，進入淑德女校，擔任當時極少見的女子體育教師。見衢州市志編纂委員會編，《衢州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頁 1190。

86 蔡倪端儀，1915 年於廈門女學任教，抗戰後期從商，組織安海蔡氏慈善公會、安海育嬰堂、安海醫院等，著有《行素集》，曾任福建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見陳苗編，《晉江市人物志》（上海：三聯書店，1994），頁 125-126。

學校長駱靜儀，[87] 以及共黨烈士胡焦琴(1902-1927)。[88] 這五人中有四人的通信集中於「草創期」，可推論早期會應用通信的女性多是世家閨秀，她們具有社會實現的資源，留下歷史記錄的比例較高，中後期的女性讀者雖然增加、來源更廣泛，卻多是沒沒無聞，唯一有史可載的胡焦琴，為出身貧困的共黨烈士，相較於男性得以文化參與（編輯、學者、作者）歷史留名，她是以生命為代價。

（四）通信議題的分布

觀察通信議題的分布，「婚戀」是最常被討論的議題，佔全部通信的 36%，其次是「教育」佔 22%，再次之是「生活資訊」佔 11%、「醫療諮詢」佔 10%。有四分之一的讀者會在通信中提到「生活經驗」，均佔男女比例四成。「互議」則是指在通信中談論到其他人的文章，佔 12%，這是讀者間透過媒體所建立的關係，有五分之一的女性會提到其他的通信，男性則只有五十分之一，顯示女性比男性更傾向於溝通，她們引述或回應他人，而不只是闡述自己（見表四）。

進一步比較性別在議題上的分布，「婚戀」最容易透露通信者性別，男性佔五成，女性則只有二成，女性比例與雜誌曾舉辦「我之理想配偶」徵文活動的記錄相當，可見男學

---

87 記載 1924 年第一期黃埔軍校學生趙志超通信處為「吉林省城後新街縣立第一女子小學校校長駱靜儀」，陳予歡，《軍中驕子：黃埔一期縱橫論》（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2），頁 70。

88 胡焦琴，1922 年入浙江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1926 年任小學教師，加入共產黨，後根據黨指示加入國民黨，任縣黨部婦女部長，1927 年死於清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編，《中華著名烈士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 494-497。

表四　各議題所佔性別比例

議題	則數	佔全部通信比例	不明性別者比例	男性比例	女性比例
婚戀	365	36%	33%	50%	21%
生活經驗	91	25%	11%	38%	38%
教育	81	22%	17%	23%	33%
互議	45	12%	16%	2%	21%
生活資訊	40	11%	20%	3%	1%
醫療咨詢	35	10%	15%	6%	3%
家庭	34	9%	10%	9%	8%
性	28	8%	8%	9%	4%
編務建議	27	7%	7%	9%	7%
職業	24	7%	6%	6%	8%
社交	17	5%	3%	5%	7%
生育	16	4%	4%	4%	4%
經濟	14	4%	4%	2%	5%
國家	14	4%	1%	4%	11%
階級	12	3%	2%	6%	3%
宗教	11	3%	2%	4%	4%
法律	11	3%	3%	4%	1%
服儀	11	3%	2%	2%	8%

生對該議題的關注，女性則相對退縮。[89]「婚戀」是五四時期備受關注的議題，[90] 讀者們也熱衷於討論，[91] 相關通信始於 1920 年，內容由觀念倡議，逐漸轉爲個人處境的揭露，讀者開始分享個人故事，他們想要解除婚約，但又恐懼自由戀愛的不穩定。

「婚戀」通信最高記錄在 1923 年 12 月號的 18 封通信，包括〈五位想解約者的來信〉，和三位轉述友人失戀故事的〈戀愛的危險〉。這些編纂在一起的集體敘事，不再是通信者的個人經驗，而是知識青年的共同處境：他們被迫從現代公共空間（城市、學校）返回傳統的家族領域，接受舊式的性別倫理。《婦女雜誌》鼓勵他們追求個人自由的新道德，但在他們努力之後，新女性卻又可能帶給他們失戀的痛苦。產生矛盾趣味的是，當新青年們被新女性離棄時，編輯章錫琛的態度。趙慕蓮被「養尊處優的女子」拋棄，醒悟戀愛結婚是有錢人的享受，一般人還是娶舊式女子好，章錫琛不回

89 根據《婦女雜誌》「我之理想配偶」徵文活動的紀錄，有 129 位男性投稿，26 位女性投稿，女性的比例僅佔 17%，與女性婚戀通信僅佔二成的比例相符；學生則有 90 人，佔全部比例的 58%。見瑟廬，〈現代青年男女配偶選擇的傾向〉，《婦女雜誌》，卷 9 號 16（1924 年 1 月）頁 43-54。

90 婚戀思想研究見許慧琦，〈《婦女雜誌》所反映的自由離婚思想及其實踐——從性別差異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2004 年 12 月）頁 97-99。許慧琦，〈1920 年代的戀愛與新性道德論述——從章錫琛參與的三次論戰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6（2008 年 12 月），頁 29-92。

91 王平陵和謝似顏都曾批評談論戀愛太多，是因讀者大多為中學生，因編輯「迎合青年心理，藉此推廣雜誌銷路的手段」。見記者，〈我們今後的態度〉，《婦女雜誌》，卷 10 號 1（1924 年 1 月），頁 2-7。

應。[92] 無政府主義者華林失戀，章錫琛不回應。[93] 張絅之友人遭毀婚，章錫琛認爲，以結婚爲前提的介紹等於傳統納采，根本不是自由戀愛，[94] 但在回答其他通信時，他卻又說：「不相識的男女沒人介紹，而互相談話或通信，恐怕不能算做正當。」。[95] 顯見在面對男性失戀時，章錫琛也沒有定見，他不能像鼓勵自由戀愛一樣，要求男性勇於承擔自由的風險。

另一方面，是新青年遇到舊婚約時，有許多情緒的表達，追求個人自由的新道德鼓勵他們這麼做，公共空間容納婚戀自主。但是當新青年遇到新女性時，他們就羞於啓齒了，他們的失戀經驗，多數是經友人轉述，被搬上公共空間。唯一自述失戀經驗的，是自稱「智識尚未開化」的士兵，章錫琛給他的建議是，去談另一次戀愛，或去追求學問或事業，且和先前矛盾的是，他說：「戀愛當然以結婚爲歸結」。[96] 新青年的失戀經驗被雙重否定，他們自己不敢講，被轉述也不爲公共論壇的主人所承認，失戀的新青年是公共空間恥辱的印記，但沒讀過書的士兵不同，他需要的是自我提升。

女性陳述婚戀的通信遠低於男性，第一位討論婚戀的女

92 耀山，〈戀愛失敗者的憤言〉，《婦女雜誌》，卷 9 號 12（1923 年 12 月），頁 138。

93 東濟，〈華林君的失戀事件〉，《婦女雜誌》，卷 9 號 12（1923 年 12 月），頁 146。

94 張絅之，〈戀愛的危險〉，《婦女雜誌》，卷 9 號 12（1923 年 12 月），頁 150。

95 記者，〈回愛瑛：男女社交的兩個疑問〉，《婦女雜誌》，卷 9 號 10（1923 年 10 月），頁 151。

96 章錫琛，〈回朱武：一個失戀的兵士的來信〉，《婦女雜誌》，卷 9 號 10（1923 年 10 月），頁 152。

性出現在 1921 年 4 月，是早期家政專欄作家繆程淑儀，[97] 她已熟悉在公共領域發言，認爲自由戀愛是避免離婚的要件，但是女性如何擁有自由戀愛的前提呢？她並沒有說。大部分女性對自由戀愛仍羞於啓齒，二年後才有女性敢於陳述自己的婚戀經驗，紹興女師余芝華歷經重重阻礙，自由戀愛招贅成功；[98] 自詡爲新女子的如水，卻希望爲夫另蓄一妻；[99] 中學生耿簫秋與大學生的戀愛受阻；[100] 北京女師江見覺之友被迫嫁人；愛上有婦之夫的余亦人；受婆家欺壓而想自殺的張梅仙；相信眞愛無關性別的王卓。[101] 比較男女雙方婚戀通信，可以發現大多數的男性講的是同一個故事，他們的通信多，而容易被編輯爲集體敘事，指向單一目標，解除婚約。而少見的女性婚戀通信卻都是不同的故事，她們的經驗難以被收編，她們既不是男性故事中，急於被擺脫的舊女子，也不是朝三暮四的新女子。

這些被編纂整合的婚戀通信，突顯編輯的能力，章錫琛能將這些散落各地、爲婚戀苦惱的青年們，整合爲充滿情感的社群，他們容易接受指引，辨識問題的因果關係，感受自

---

97 繆程淑儀，〈離婚的預防〉，《婦女雜誌》，卷 7 號 4（1921 年 4 月），頁 125。

98 余芝華，〈我的婚姻史的一段〉，《婦女雜誌》，卷 9 號 6（1923 年 6 月），頁 59。

99 如水，〈為夫另蓄一妻的可否〉，《婦女雜誌》，卷 9 號 9（1923 年 9 月），頁 154。

100 耿簫秋，〈戀愛的波折〉，《婦女雜誌》，卷 9 號 9（1923 年 9 月），頁 155。

101 余亦人，〈通訊九〉、張梅仙，〈通訊十〉、江見覺，〈通訊十一〉、王卓，〈通訊十三〉，《婦女雜誌》，卷 10 號 1（1924 年 1 月），頁 322-325。

己在社會的位置。透過「婚戀」形塑而成的公眾意識，既是男性私密經驗的公共化、也是男性公共領域的私密化，他們一反男子氣概地鬧脾氣，這些情緒性的書寫並不妨礙他們進入公共領域。女性則需要更多時間，證明個人經驗是可以被承認時，她們才會現身，但男性主編章錫琛缺乏編纂女性敘事的能力，儘管他對女性回信更爲委婉懇切，仍難以形塑女性的公眾意識，她們散落、邊緣，缺乏可被統整的共同目標。

辨識性別身分的次高議題是「教育」，有 56%的讀者會表述出性別身分，女性佔 33%、男性佔 23%、學生佔 24%、教師佔 13％。相較於女性對「婚戀」議題的遲疑，有三分之一的女性通信關注「教育」議題。學校是女性進入公共領域的起點，她們離開被嚴格限制的家庭空間，發展同性情誼，也意識到這個備受期待的新身分。草創期的讀者謝婉瑩（冰心，1900-1999），[102] 1919 年仍是尚未成名的十九歲女學生，她在《晨報》發表〈「破壞與建設時代」的女學生〉，[103] 不同於她日後溫婉的筆觸，她犀利地諷刺各種進步論述對女學生的再現，她們得以從古典文學中獲取資源，也能思考到自己新的社會位置。

相對於女教師與女學生的優勢發言，失學者「誌玉」是少數弱勢的通信者，她因父母守舊，讀完高小即不再升學，她來信求救，章錫琛告訴他，可請未婚夫家代爲求情或自學。[104] 作爲典型失學女性案例，她暴露女性處境的艱難，

102 冰心自述，《婦女雜誌》「文苑欄」，是她習詞的啟蒙讀本。見冰心，《冰心自述》（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頁 107。

103 謝婉瑩，〈「破壞與建設時代」的女學生〉，《晨報》，1919 年 9 月 4 日，第 7 版。

104 誌玉，〈通訊十八〉，《婦女雜誌》，卷 10 號 2（1924 年 2 月），

沒有自主能力，而只能透過父權協商。這些優勢的、積極的、弱勢的讀者通信，表現不同階層女性經驗的交錯，她們指導、珍惜求學機會，但也顯出徬徨，因爲社會還未提供升學到就業的管道。

男性通信者在教育議題總是指導女性或爲其代言，前述《婦女雜誌》早期專欄譯者，同時也是忠實讀者的惲代英，將雜誌作爲妻子的家庭教育讀本，[105] 這並非個案，許多男性讀者都這麼做。丁小石說：「偶與山妻孺子有所譚論。微覺有不能達意之處。則以其中關於科學者。非婦孺所盡了解。」[106] 嚴敦易反映：「婦女雜誌改版後，女性讀者『現在弄的莫名其妙了，不知說的什麼？叫人看了不懂！沒有意思！』。[107] 葉健行多次懇求家族同意讓妻子上學。[108] 小學教師LF呼籲同業能在暑假教育妻子，使她們能治理家務，並有節制高尚的娛樂，回應丈夫的情感。[109] 師範學歷的許本源嫌棄未受教育的妻子是「寄生蟲」，希望她求學後可以掙錢。[110] 針對女性失學的問題，章錫琛推薦進德女校、成章

頁 162。

105 周敍琪，〈閱讀與生活——惲代英的家庭生活與《婦女雜誌》之關係〉，《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卷 43 期 3，頁 107-190。

106 丁小石，〈通信問答〉，《婦女雜誌》，卷 3 號 7（1917 年 7 月），頁 14。

107 嚴敦易，〈現在婦女所急需的出版物〉，《婦女雜誌》，卷 9 號 7（1923 年 8 月），頁 62。

108 葉健行，〈成年失學婦女的就學問題〉，《婦女雜誌》，卷 9 號 6（1923 年 6 月），頁 145。

109 LF，〈我們在暑假中的最大任務（教導妻子）〉，《婦女雜誌》，卷 9 號 2（1923 年 8 月），頁 63。

110 許本源，〈失學婦女的求學問題〉，《婦女雜誌》，卷 9 號 11（1923 年 11 月），頁 233。

女校等，進德女校教師卞樹錕、何仲蕭也來信回應，這在讀者間引起迴響，有更多人反應成年女子教育的需求。「教育」議題所塑造的「公眾意識」，不僅是「婚戀」議題所強化的青年集體情感，它更具有公共服務的功能，媒和教育需求與供應者，具有轉化社會資源的意義。

「婚戀」與「教育」議題分佔所有通信的一、二位，也因爲容易揭露性別經驗，而能分辨男女讀者的差異，前者爲私密經驗，後者是公共話題。男性得在公領域表露私密經驗，女性則不，她們傾向在公共領域討論公共話題。在整體議題發展上，還可以發現有四分之一的讀者會談到個人「生活經驗」，但只有二十五分之一的讀者會提到「國家」。「成長期」的改組，顯示新文化運動進入主流文化體制，將殘餘的性別秩序排擠出去，個人意志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讀者學習自我揭露，個人經驗在公共溝通中獲得一席之地，國家影響卻微乎其微。

四、結　論

《婦女雜誌》通信欄始於 1915 年，終於 1931 年，見證民國肇始，社會風氣漸開，新文化運動蓬勃，而戰爭威脅尚未全面籠罩的時期。此時，主流商業媒體開始重視讀者關係，個人經驗進入公共領域，他們不僅可關注政治改革、公共福祉，還能將個人境遇化爲集體表述，產生抗衡傳統秩序的革新力量。呂芳上的研究指出，讀者踴躍發言，是五四的一大特色，但到 1923 年後，「破家立我」的個體價值，逐

漸讓位於「破家立國」的集體動員。[111] 1930 年，左翼文學聯盟提出「工農兵通訊運動」，在各地招募地方通訊員，以揭露社會現實爲目標，[112] 也有愈來愈多的讀者透過通信反映生存問題，如廣受歡迎的《生活》週刊「讀者信箱」(1926-1933)，主編鄒韜奮原先勸勉讀者自我提昇，但發現此舉並無助於個人生活的改善，轉而呼籲抗日救國的集體目標。[113]

《婦女雜誌》通信欄發展於晚清國家女權主義之後，抗日愛國運動之前，它追求自由主義女權的個人解放，儘管鼓吹女性經濟獨立，擁有自己的職業，但卻甚少討論階級因素。[114] 根據資料顯示，1919 年全國高小女性有 21.7 萬餘人，其他各類女校有 18 萬人，[115] 她們是刊物上的女性通信者。而當時的上海女工，總人數已達 25 萬人，[116] 卻不曾見她們表明身分的通信。1924 年 1 月號，共產黨女性創始人向警予(1895-1928)發表〈今後中國婦女的國民革命運動〉，[117] 王政將之解釋爲「馬克思主義競爭性話語的出現」，[118] 同年 6

111 呂芳上，〈192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有關情愛問題的抉擇與討論〉，《無聲之聲 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1600-195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73-102。

112 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新的情勢及我們的任務〉，《文化鬥爭》，卷 1 期 1（1930 年 8 月 15 日），頁 9-10。

113 葉文心，《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臺北：時報，2010)，頁 150-181。

114 僅有 12 封通信，提到階級議題，佔所有通信三十分之一。

115 彭明，《五四運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 624。

116 曙梅，〈上海婦女的生活〉，《新婦女》，卷 1 期 1(1920)，頁 26-29。

117 警予，〈今後中國婦女的國民革命運動〉，《婦女雜誌》，卷 10 期 1（1924 年 1 月），頁 47。

118 Wang Zhe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y*, pp. 107-118.

月號，「我的職業生活」徵文，時廿歲曾任小學教員，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員鄧穎超(1904-1992)發表〈工讀的失敗〉，[119] 揭露社會壓迫與抵抗思想。該號還有唯二的女工「盧蘭」和「秀英」現身。[120] 這些讀者可能僅佔《婦女雜誌》很小的一部分，他們買不起報刊，但透過補習學校、工廠閱報處取得資訊，開始嘗試接觸發言的媒體，儘管這些階級經驗不曾出現在通信中，而是以專題徵文的方式存在。

《婦女雜誌》通信欄具有開創讀者市場，銜接大眾書寫的意義，它更適於解釋中產階級公共領域的運作。美國學者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於 1926 年提出的公眾理論，有助於解釋民國初期的商業媒體形塑「公眾」的功能。杜威認爲公眾是透過主體互動產生的，若只對當下的行動者產生影響是「私人的」，若能超出當下的行動者，而影響其他的群體則是「公共的」，「公眾」指的是未參與行動，卻能感知到共同利害關係的人們。[121] 杜威認爲良好的媒體具有引導個人成爲公眾的作用，透過揭露訊息，以及各種細緻、生動的溝通技巧，人們得以了解事件的因果，以及彼此的利害關係，發現、認知並辨識自己在社會上的位置。讀者藉由參與媒體的經驗，學習分享，並發展出自我引導、判斷的能力。以此理解《婦女雜誌》通信欄，是編輯如何編纂個人經驗使

---

119 鄧穎超，〈工讀的失敗〉，《婦女雜誌》，卷 10 期 6（1924 年 6 月），頁 120。

120 盧蘭，〈哀苦餘生錄〉，《婦女雜誌》，卷 10 期 6（1924 年 6 月），頁 116-119；秀英，〈從磨折中逃出的自由生活〉，《婦女雜誌》，卷 10 期 6（1924 年 6 月），頁 133-135。

121 Dewey, J.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27).

之離開個別行動者，進入公共領域，形成「公眾」，觸發讀者的情感認同，連結互不相識的人們，而有集體行動的意識。

本文可歸結個人經驗進入公共領域的通信爲三類。第一類、以個人生活諮詢進入公共領域，如詢問生活資訊、醫療問題或提供編務建議，讀者們從中了解馬口鐵的用處，知道如何服用盤尼西林，或者指正錯字，此舉無助於經營社群認同。因爲這樣的個人經驗瑣碎而針對性高，容易表述爲個別讀者與編輯間一對一的關係，而難以延伸到其他人。此類通信集中出現於「草創期」與「復古期」，表現草創期讀者與刊物彼此摸索的關係，主編王蘊章一直在尋找適當的方式，安置讀者的意見，但他避免表述立場的態度，難以引導讀者思考並解決問題。在「復古期」再出現這類通信，則是重複的問題不斷出現，主編杜就田缺乏溝通的信誼，無法累積傳播經驗與效果，難以建立穩定的讀者關係，導致讀者無法學習也沒有進步，公眾意識匱乏，而只能止於個人。

第二類、以個人生活經驗回應社會問題，也是表現最爲成功的公眾範例，以婚戀與教育議題爲代表。婚戀與教育都是五四運動時期熱烈討論的話題，青年藉由教育取得外部資源，轉而對抗家族壓力，爭取個人的婚戀自由。透過這類通信，讀者連結相應的社會位置、相似的生活處境，集結爲同病相憐的集體意識，青年們異地共時地控訴舊婚約的束縛，女性闡發失婚失學的痛苦。這些散落各地的行動得以形成公眾的反叛，男性作爲積極行動者，能解除婚約，但女性卻成爲受害者，她們依賴父權協商，或只能思考殘餘的解決方案（出家、自殺、納妾）。由此可見，性別角色在公共領域的差異，男性可藉由公共討論取得資源，但女性卻不能。女性

在公共領域中穩重謹慎的表現，反而反映出她們邊緣、異常的存在。男性不需仰賴理性溝通的姿態，即使他們充滿情緒，即使他們談論的是婚戀的私密話題，但他們的性別身分就是公共領域的資格。相形之下，女性迴避私密話題，她們支持教育議題，她們從新文化運動的男性知識分子習得這些語言，並複習這些語言，站在公共領域的位置，她們還羞於展示私密的經驗，而傾向論述公共活動。如此反映《婦女雜誌》的媒體性別經驗，與我們熟悉的日常性別氣質相反，這裡的男性瑣碎、抱怨，探討性別議題的公共領域容納他們的情緒書寫。但女性卻更爲自重自持，她們必須小心翼翼維護自己的公眾形象，謹慎看守得來不易的公共空間。但當女性在婚戀的現實上打擊男性，讓他們嚐到自由戀愛的苦果時，男性會轉趨沈默，他們的失戀故事只能被轉述，被新自由道德挫折的男子在這裡無法發言，他們在這裡不構成公眾，他們是公共領域的失敗者。而這些打擊他們的女性也非主動發言，她們被轉述爲公共領域的失德者，見異思遷或虛榮任性，而非勝利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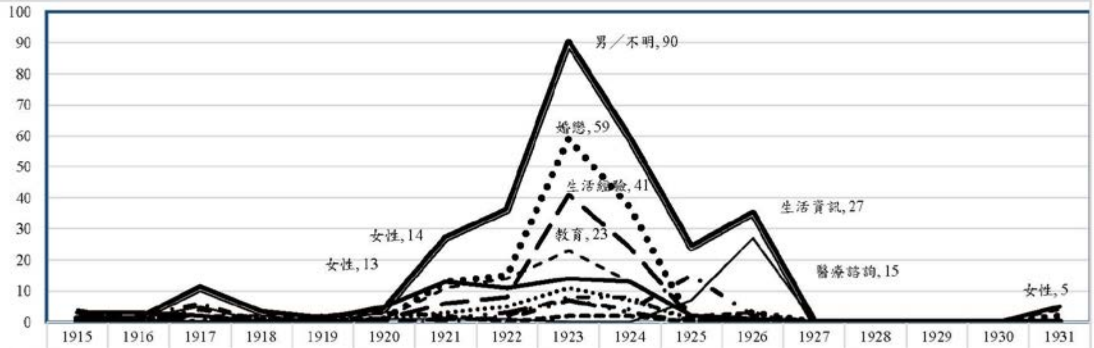
女性以個人經驗回應社會問題而進入公共領域，集中於「再興期」，主編葉聖陶將之編纂爲女性的集體控訴，顯現新階段女性主體意識的發展。此時出現第一位非教師的職業女性，顯示性別經驗由家庭、學校延伸到職場，當社會出現容納女性的新位置時，她們才能思考舊秩序的壓迫，反抗過去分派的角色，形成女性公眾的反叛。

第三類、以個人觀點挑戰社會禁忌，而被驅逐出公共領域，這樣的代表是「成長期」主編章錫琛本人。章錫琛原是良好的公眾引導者，他持續從讀者的回應中獲取資源，並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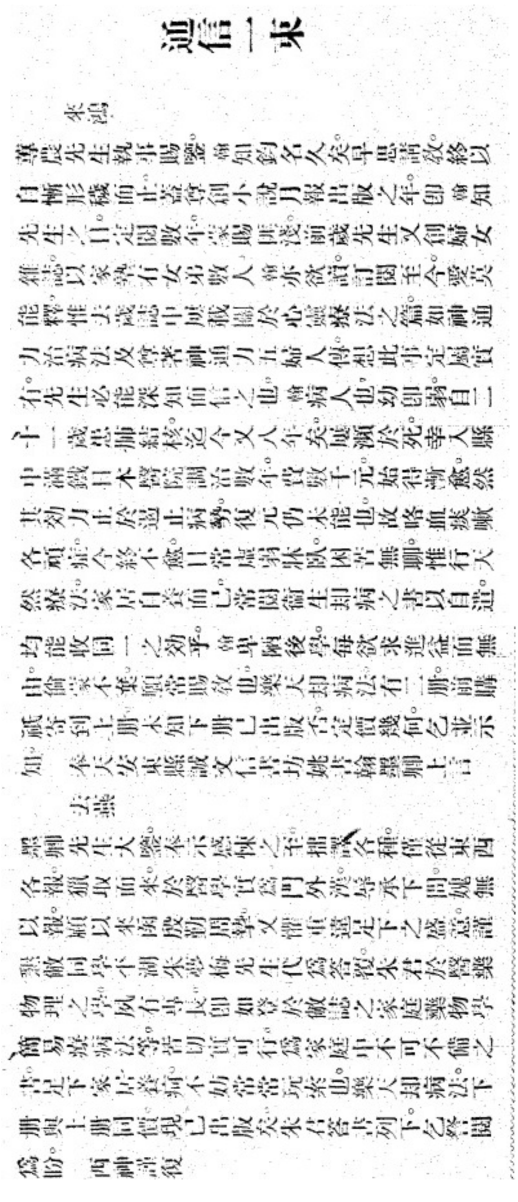
請讀者進入編輯室，認識訊息產製的過程，雙方持續有效的互動，形成上述第二類成功的公眾範例。但章錫琛最終因為推動「新性道德」，捨棄與讀者溝通的管道，他以個人觀點挑戰社會禁忌，但是大眾難以啓齒的性經驗，無法以第二類通信進入公共領域支撐他的見解，於是他轉而應用第一類方式，以「醫事衛生顧問」取代開放的「通信」，將性議題包裝為個人醫療諮詢服務，從而再陷入第一類方式單向傳播的僵局。他一意孤行，失去公共溝通的技巧，開始限制讀者意見，但讀者並不順從，終至雙方決裂，從而失去公眾，他被迫離開商務印書館，並使雜誌風格由開放前衛轉趨防禦保守。

通信使讀者的理性、情感、道德得以表現，書信體縮短讀者與編輯的心理距離，他們渴望被看見、回應，並傳遞程度不一的對媒體的信任，認為問題被公開就有解決的可能。上述歸納的三類通信方式，表現報刊將私事轉為公事的媒介特性，但光是公開刊載並不足以形成「公眾」，讀者需要激發共鳴的議題，需要有意義規劃的版面，需要編輯情理兼具的回應。讀者參與、學習媒體的經驗，經過多元議題的接觸、討論後，會更清楚面對自己的位置，培養對其他讀者的同理心，同時也可能引發讀者集體反彈，被消音的「通信欄」暗示著編輯與讀者間可能的衝突。

圖一　歷年通信分布圖（性別、議題／年代）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男／不明	1	1	11	3	1	4	27	36	90	59	24	35	0	0	0	0	0
女性	3	3	2	0	1	5	13	11	14	13	2	1	0	0	0	0	5
婚戀	0	0	0	0	0	1	13	15	59	37	0	3	0	0	0	0	2
生活經驗	3	0	2	0	0	1	6	8	41	24	1	0	0	0	0	0	5
教育	3	1	2	2	2	1	11	14	23	13	2	3	0	0	0	0	4
性	0	0	0	0	0	1	3	5	11	7	1	0	0	0	0	0	0
生育	0	0	0	0	0	0	1	3	7	3	0	0	0	0	0	0	2
國家	1	0	0	1	2	3	2	0	2	2	0	0	0	0	0	0	0
生活資訊	4	1	5	0	0	1	1	1	0	0	7	27	0	0	0	0	0



圖二　王蘊章通信範例

一個失戀的兵士的來信

錫琛先生:

學生今有兩個疑問,本來是無研究的價值,和詢問的道理,不過以智識很淺單的我,實在解決不下,望先生明白指示,以解學生的狐疑。

(一)男女間發生愛情,一定要結為夫婦的麼?

(二)凡人受失戀的痛苦,如何纔能自救呢?

以上二種,請先生費幾分鐘寶貴的光陰,在本期貴雜誌上通訊欄內賜復,則學生感激得很了。　學生　朱武鐘上。

(附告)學生自幼失學,僅在初小畢業,自知普通智識,尚未受完,備今瞎寫瞎問,恐惹先生作氣。但學生是弱冠之年,現在軍界當一份兵,每日得暇輒閱婦女雜誌等,生不敢誑誕,生之知識稍有進步者,皆貴雜誌之所賜也。貴雜誌不啻為生之良師良友,終身伴侶也。下面所寫的一個她,亦是生說不出一點的苦衷,先生可否刪改刪改,登在本期的雜誌上。

不要想起她便能,若是想起她,真添我無限悲感和哀愁。

我不想起她嗎,那是不能。

她那嬌嫩身軀,玫瑰面龐,笑時還帶着兩個酒渦,和那水汪汪的眼珠,嫵媚的倩影,深深印入我的腦海裏,嵌在我的心坎中,要不想她,萬萬不能。

十二,八,二,晚,書於兵士自修室。

朱武先生:

關於你的兩條疑問,簡單地答覆如下:

(一)戀愛當然以結婚為歸結,但事實上不能結婚的時候,自當別論。

(二)慰解失戀的苦痛,有兩種方法:其一,另求戀愛;其二,從此絕意於戀愛,去研究一種學問,或幹一種事業,以排遣自己。

章錫琛。

圖三　章錫琛通信範例

徵引書目

一、報刊

《中學生》（上海），1931。
《文化鬥爭》（上海），1930。
《民國日報》（上海），1920。
《婦女雜誌》（上海），1915-1931。
《晨報》（北京），1919。
《現代評論》（北京），1925。
《晶報》（上海），1923、1925。
《新青年》（上海），1918。
《新陝西月刊》（西安），1931。
《新婦女》（上海），1920。
《學生雜誌》（上海），1923。

二、專書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中共上海黨史大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 1 集》。北京：中華書局，2012。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編，《中華著名烈士第二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6。

王榮華編，《上海大辭典下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
王警濤，《民生主義與人口問題》。上海：民智書局，1927。
冰心，《冰心自述》。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
西南師範大學教授名錄編寫組編，《西南師範大學教授名錄》。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宋維遠編，《瑞安市志下》。北京：中華書局，2003。
宋聲泉，《民初作為方法：文學革命新論》。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5。
李金銓編，《文人論政：民國知識分子與報刊》。臺北：政大出版社，2009。
李金銓編，《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
李盛平，《中國近現代人名大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
周家珍編，《20 世紀中華人物名字號辭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周敘琪，《一九一〇～一九二〇年代都會新婦女生活風貌——以《婦女雜誌》為分析實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6。
南京市檔案館編，《民國珍檔民國名人戶籍》。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
柯惠鈴，《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1900-1920》。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2。
胡愈之，《胡愈之文集第二卷》。北京：三聯書店，1996。
范橋編，《書信寫作鑒賞辭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

唐小兵，《現代中國的公共輿論：以《大公報》「星期論文」和《申報》「自由談」爲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張暉，《施淑儀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
張德泉，《張德泉花卉白描寫生》。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02。
張麗萍，《報刊與文化身分：1898-1981 中國婦女報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陳予歡，《軍中驕子：黃埔一期縱橫論》。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2。
陳苗編，《晉江市人物志》。上海：三聯書店，1994。
陸陽，《胡氏三傑，一個家族與近代中國科學教育》。上海：三聯書店，2013。
彭明，《五四運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程曼麗編，《中國新聞傳媒人物志第六輯》。北京：北京上德經緯文化傳媒，2014。
黃典權編，《重修臺灣省通志卷九人物志人物傳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8。
黃延復，《二三十年代清華校園文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黃興濤，《「她」字的文化史：女性新代詞的發明與認同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楊天石，《國民黨人與前期中華民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葉文心，王琴、劉潤堂譯，《上海繁華：都會經濟倫理與近代中國》。臺北：時報出版，2010。
熊月之編，《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劉人鋒，《中國婦女報刊史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劉巨才，《中國近代婦女運動史》。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4。
潘醒農，《潮僑溯源集》。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
錢仲聯編，《中國文學大辭典下冊》。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
戴仁，《上海商務印書館 1897-1949》。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謝菊曾，《十里洋場的側影》。廣州：花城出版社，1983。
衢州市志編纂委員會編，《衢州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Dewey, J. *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27.
Kaniss, Phyllis C. *Making Local New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Lean, Eugenia. *Public Passions: the Tria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in Republic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Ma, Yuxin. *Women Journalists and Feminism in China, 1898-1937.* Amherst, N. Y.: Cambria Press, 2010.
Roseau, J. N.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N.Y: Random House, 1961.
Wang, Zheng.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三、論文

江勇振，〈男人是「人」、女人只是「他者」：《婦女雜誌》的性別論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2004 年 12 月，頁 39-67。

呂芳上，〈1920 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有關情愛問題的抉擇與討論〉，收入呂芳上編，《無聲之聲 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國家(1600-195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73-102。

周武，〈文化市場與上海出版業(1912-1921)〉，收入蘇智良編，《上海：近代新文明的形態》。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4，頁 175-192。

周敘琪，〈民國初年新舊衝突下的婚姻難題——以東南大學鄭振壎教授的離婚事件為分析實例〉，收入王政、陳雁編，《百年中國女權思潮研究》。上海：復旦大學，2005，頁 88-107。

周敘琪，〈閱讀與生活——惲代英的家庭生活與《婦女雜誌》之關係〉，《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卷 43 期 3，2005 年 7 月，頁 107-190。

胡曉真，〈文苑、多羅與華鬘——王蘊章主編時期(1915-1920)《婦女雜誌》中「女性文學」的觀念與實踐〉，《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2004 年 12 月，頁 195-218。

張哲嘉，〈《婦女雜誌》中的「醫事衛生顧問」〉，《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2004 年 12 月，頁 145-168。

章霈琳，〈性文化與期刊出版：以《玲瓏》(1931-37)為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5，2015 年 6 月，頁 117-192。

章錫琛，〈漫談商務印書館〉，收入商務印書館編，《商務印書館九十年(1897-1987)》。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頁 117。

許慧琦，〈《婦女雜誌》所反映的自由離婚思想及其實踐——從

性別差異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2004 年 12 月，頁 97-99。

許慧琦，〈1920 年代的戀愛與新性道德論述——從章錫琛參與的三次論戰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6，2008 年 12 月，頁 29-92。

陳世敏，〈讀者投書：「接近使用權」的實踐〉，《新聞學研究》，期 41，1989，頁 25-46。

陳姃湲，〈《婦女雜誌》(1915-1931)十七年簡史——《婦女雜誌》何以名爲婦女〉，《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12，2004 年 12 月，頁 1-38。

楊琥，〈章士釗與中國近代報刊「通信」欄的創設——以《甲寅》雜志爲核心〉，《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卷 36 期 4，2012，頁 100-108。

Mittler, Barbara. “In Spite of Gentility: Women and Men in *Linglong* (Elegance), a 1930s Women’s Magazine,” in Daria Berg and Chloë Starr eds., *The Quest for Gentility in China: Negotiations Beyond Gender and Class*.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Nivard, Jacqueline. “Women and the Women’s Press: The Case of the *Ladies’ Journal* (*Funü Zazhi*) 1915-1931,” *Republican China*, Vol. 10-1b, November, 1984, pp. 37-55.

四、網路資料庫

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http://www.cnbksy.com/home（2016 年 8 月 26 日檢索）。

申報全文數據庫，http://spas.egreenapple.com/WEB/INDEX.html（2016 年 8 月 26 日檢索）。

近代婦女期刊資料庫，http://mhdb.mh.sinica.edu.tw/magazine/（2016 年 8 月 26 日檢索）。

晚清民國大報庫，http://db.ersjk.com/userReadAction.action?prId=88&page=dbhj（2016 年 8 月 26 日檢索）。

讀秀數據庫，http://www.duxiu.com/（2016 年 9 月 20 日檢索）。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the Public Sphere: "Readers' Letters" on the *Ladies' Journal* (1915-1931)

Wei-chun Yeh*

Abstract

Intellectuals occupy many primary positions in the public sphere. As a result,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s treated as the subject of enlightenment. This method of disseminating information is generally one-way and may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accurately gauging the social impact of information.

In this study,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readers' letters on the *Ladies' Journal* with high circulation and history in China. The questions addressed include the following: how do the letters establish an effective method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general public and an individual; how can gender impact the citizens communicate, and how can the readers influence the public?

The results show that men exposed more emotional writing in the public domain of gender issues, but women were more self-reserved and maintained the hard-won public space. Male editors were more likely to compile male

*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experiences as accusations of backward marriages, but he can't grasp different and scattered experiences of female stories. The editor challenged the social boundaries of "sex" to conflict with some readers, therefore he close the "readers' letters column", and canceled the public discussion space. On the whol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led to the freedom of media to promote the reader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the less mention of the "state", but such liberal feminism would soon become national feminism as the war approaching.

Key Words: gender, individual experience, *the Ladies' Journal*, public sphere, readers' letters